

邱涛◎著

民国的教训

腐败与反腐败较量实录

中国方正出版社

非外借

MINGUODEJIAOXUN

邱涛◎著

民国的教训

腐败与反腐败较量实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的教训：腐败与反腐败较量实录/邱涛著.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 1

ISBN 978 - 7 - 5174 - 0262 - 6

I. ①民… II. ①邱… III. ①反腐倡廉 - 历史 - 中国 - 民国
IV. ①D693. 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3858 号

民国的教训

——腐败与反腐败较量实录

邱 涛 著

责任编辑：杨 睿 王楚楚

责任校对：张 蓉

责任印制：李 华

出版发行：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100053)

编辑部：(010) 59594709 发行部：(010) 66560936

出版部：(010) 59594625 门市部：(010) 66562755

邮购部：(010) 66560933

网 址：www. lianzheng. com. 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7. 75

字 数：19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5174 - 0262 - 6

定价：38.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编 武夫当国与体制腐败

第一章 袁世凯集团：政治贿买与体制性贪腐	(5)
引言：大总统也贪腐	(5)
一、为了皇帝梦，用钱买文武	(6)
二、软禁和贿买，对黎副总统双管齐下	(9)
三、挥霍国帑，笼络满蒙遗老	(11)
四、捞钱靠权力，为贪腐费尽心机	(13)
五、贿买和暴力，对政敌依然是两手	(14)
六、袁段斗法，集团腐败大曝光	(16)
七、黎段权争，“刚正廉洁”竟是伪善	(21)
第二章 曹锟贿选与北洋“武金政治”	(26)
引言：武金政治的“活丑剧”	(26)
一、曹锟想过把“总统瘾”	(27)
二、傀儡总统毕竟“合法”	(29)
三、国会停摆选不了总统	(33)
四、“买”议员回京	(39)
五、“贿选”总统	(46)

六、曹锟颉颜出任总统	(52)
七、贿选遗毒：西式民主声名狼藉	(57)
延伸阅读① 北京政府时期的监察机制	(61)
一、平政院与肃政厅	(61)
二、地方监察机制和机构	(63)
三、分司弹劾制	(64)
四、审计机构	(65)
五、官吏惩戒机构和程序	(67)

第二编 政争与腐败

第三章 新军阀混战、政治购买与蒋介石下野	(75)
引言：购买老手走麦城	(75)
一、中原大战后企图肢解冯、阎	(76)
二、冯玉祥替反复无常的石友三“要钱”	(80)
三、蒋介石以禄位分化石友三“盟友”	(83)
四、雷马事变与宁粤的金钱角力	(88)
五、宁粤对峙中的购买分化	(91)
六、民族危机下的政治妥协	(94)
七、蒋介石下野	(103)
第四章 招商局案与“特委会”的政争	(106)
引言：抗倭英雄？贪官？	(106)
一、孙科、陈铭枢内阁	(107)
二、“焦头烂额”的孙、陈政府	(110)
三、“特委会”成立与财政烂账	(114)

四、蒋、汪合流与“一二八”抗战	(118)
五、“招商局案”突然曝光	(122)
第五章 孔祥熙集团窝案与“倒孔”战役	(127)
引言：朝野同喊“倒孔”	(127)
一、孔祥熙集团腐败窝案：六大案例	(128)
二、美援与美国人的用心	(133)
三、美金公债与贪腐案	(138)
四、国民参政会倒孔反贪	(143)
延伸阅读② 南京和重庆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机制	(149)
一、中央监察机构——监察院	(149)
二、地方监察机构——监察区的划分和监察使署的 设置	(154)
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监察机构	(156)
四、七大监察职权	(163)
五、惩戒机构和惩戒制度	(171)

第三编 政治与司法腐败

第六章 监察院与宋子文“黄金政策舞弊案”	(181)
引言：舆论监督的力量	(181)
一、宋子文的“黄金政策”	(184)
二、上海爆发“黄金风潮”	(187)
三、“改弦易辙”	(191)
四、“公器私用”	(194)
五、监察院立案彻查	(197)

六、对手派系和特务推波助澜	(199)
七、监察院“彻查”报告与“有限”追究	(203)
八、病根检讨	(207)
第七章 蒋经国上海“打虎”与政治妥协	(209)
引言：一个非常夏日	(209)
一、蒋氏父子的改革：向腐化开战	(210)
二、“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216)
三、“大老虎”能否彻底整治？	(223)
四、“现在，我们失败了！”	(230)
第八章 民国司法腐败与行政干预	(234)
引言：法律和人民深深的屈辱	(234)
一、司法腐败怪象：一案拖延经年	(235)
二、司法腐败怪象：故违司法程序	(237)
三、司法腐败怪象：“自由”心证	(240)
四、司法腐败怪象：量贿定罪	(242)
五、司法腐败怪象：监狱陋规	(244)
六、行政干预司法	(247)
七、行政干预典型案例：高秉坊贪污案	(251)
延伸阅读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体制	(259)
一、监察机构和机制	(259)
二、惩戒机构	(266)
参考书目	(267)
后记	(273)

第一编

Passage One

武夫当国与体制腐败

府政民國

中华民国初立，随着孙中山被迫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临时政府所在地由南京迁到北京，民国北京政府，就由晚清即已形成的北洋集团所控制，历任大总统，多为北洋军阀集团成员。

从北洋集团首领袁世凯，到元老级人物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张作霖……他们从晚清开始，就已奉行“金钱为政治运行润滑剂”的信条，大肆贪贿，以金钱和武力为两手，来施行其统治之目的，其政治统治呈现集团式腐败和体制性腐败的特征。

袁世凯为了独裁统治、皇帝迷梦，大肆贿买；大总统徐世昌，连下属陋规的“小便宜”也要贪占。对于大总统的贪腐，难道没有制约体制吗？民国体制设计中当然是有的，国会就可对大总统提起弹劾。但“曹锟贿选”说明，体制设计一旦遭遇恶意破坏，尤其是拖累社会风俗也败坏了，其后果很严重。政治人物、官员当然难辞其咎！当社会、人们不以贪贿为耻时，监督、弹劾云云，当然沦为空话，国会反而成为贪腐者“合法”利用的工具，“猪仔”国会和“猪仔”议员，不仅令贪贿者当上国家元首，也令引进而来准备用以改造中国社会、政治的西式民主宪政声名狼藉。

那么，在民国大总统之下，从国务总理、内阁阁员，到中央各部和地方各军政大员，也均有制度设计来监督、管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崇信金钱贿赂的袁世凯，却

他们从晚清开始，就已奉行“金钱为政治运行润滑剂”的信条，大肆贪贿，以金钱和武力为两手，来施行其统治之目的，其政治统治呈现集团式腐败和体制性腐败的特征。

体制设计一旦遭遇恶意破坏，尤其是拖累社会风俗也败坏了，其后果很严重。政治人物、官员当然难辞其咎！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崇信金钱贿赂的袁世凯，却是民国大总统中较为突出地强调监督机制、建立监督机构者。

想做“强项令”，脖子好像又没硬到那个程度，统治者又是这样，最后结果就只能是“有治法，无治人”，比“有治人，无治法”又能好到哪儿去？

是民国大总统中较为突出地强调监督机制、建立监督机构者。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民国北京政府建立了平政院、肃政厅这样的监察反贪机构，平政院和各类官吏（文官、司法官、审计官）惩戒委员会等惩戒机构，而且，从国务总理开始，其下各级大员，直至县长、司法官，均可以国会提起弹劾、平政院肃政厅提起弹劾、省县议会（省县立法机关）提起弹劾的机制进行监督制约。还不止此，袁世凯政府开始，就对《刑法》屡次修订，强化其中对贪污腐败等违背职务行为的惩处，并制定、公布了《官吏犯赃治罪条例》等一系列刑事特别法规。从一些人强调的“治法”而言，袁世凯统治开始的整个民国时期，“治法”似乎在走上逐步完备的正轨。这些人很强调批判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有治人，无治法”的弊端，似乎有了“治法”就一切OK。但袁世凯一方面在“有治法”，同时却“无治人”了，“治法”终不过也成了摆设。想当年，袁世凯为了当上皇帝，纵容为他称帝四处活动鼓吹的“筹安会”，当1915年9月，肃政厅全体肃政使弹劾筹安会，并要求予以惩戒，袁世凯碍于民意和官箴，不得不做点表面功夫，要求主管官署内务部“对于该会以后言论行事为之酌定范围，明令限制”，实际上这是袁世凯要他们做的，如何限制得了！全体肃政使虽再次提起纠弹，袁世凯也就不再理会，而负责监察的平政院肃政厅又能怎么样呢？想做“强项令”，脖子好像又没硬到那个程度，统治者又是这样，最后结果就只能是“有治法，无治人”，比“有治人，无治法”又能好到哪儿去？甚至到张勋复辟时，裁撤平政院肃政厅，此后再未恢复。“治人”没有了，“治法”终究也是保不住的。治人治法应并重！

第一章 袁世凯集团：政治购买与 体制性贪腐

引言：大总统也贪腐

徐世昌是北洋集团的元老。1918年，他终于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成为继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之后，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

根据当时的陋规，新总统到任照例应由财政部筹拨150万元，由财政总长曹汝霖亲手送交新总统徐世昌，作为其到任后的“零用”。按规矩，总统只收其中的100万元，余下的50万元则应由新总统分润给财政总长，但徐世昌竟然全数收下，没有按例分50万元给曹汝霖。直到“五四”运动后，曹汝霖作为卖国罪魁，爱国学生火焚其宅，有政客出面替曹汝霖向徐世昌讨要这笔“欠款”，徐世昌不得已，才“挤”出了8万元，送给曹汝霖作为补偿。

一个主张尊孔读经的总统，却置道德廉耻于不顾。身属于这个以袁世凯为首、奉行以金钱为政治运作和官场运行“润滑剂”的集团，贪腐对他而言不是潜规则，而是明规则！

可以说，北京政府时期，北洋集团的领头人，已成为最高统治

者的袁世凯，崇信自己所谓的长期从政的“成功”经验，将金钱作为官场运行的“润滑剂”。因此，在中华民国的初建时期，各级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的各种行贿收买和相应的贪腐行为，是很普遍的现象。

一、为了皇帝梦，用钱买文武

袁世凯是利用金钱为自己的权力贪婪铺路的“高手”，他在晚清寻求高官之路时是这样，贿赂权臣庆亲王奕劻、权监李莲英等，获得权力高位，在民国时期当上最高统治者后也没有改变。在他的政治购买中，为自己的独裁专制统治“稳定”人心的政治怀柔费就是其中一种。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大总统后，为了实现自己专制独裁、当上皇帝的美梦，拼命拉拢各方人士。民国时期的政学界名人梁启超就是袁世凯拉拢的对象之一，购买款起初主要由梁士诒经手。当袁世凯称帝之意越来越急切之时，又授意长子袁克定与梁启超密切接触。1915年春，因连一个币制局总裁都当不下去而饱受重挫的梁启超，正避地于清华园，埋头著书、讲学的时候，突然接到袁克定请他到小汤山赴宴的邀请。梁启超来到北京郊外的汤山温泉，发现杨度正坐在席上。因梁启超知道杨度正极力鼓吹帝制，便觉此事有蹊跷。果然，袁克定和杨度在宴席上痛诋共和，袁克定甚至问梁启超是否知道近来外间议论纷纭，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我中国国情，并说，想听听卓如（梁启超字卓如）先生高见。这是隐露出要梁启超赞同帝制之意，并暗示梁启超如能附和，他们必然不惜金

钱和官位来拉拢。但梁启超毫不避忌，如实说出自己不赞同帝制复辟的意见。双方陷入僵局，汤山之宴不欢而散。梁启超知道自己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态度公开后，将会祸及家人，因此随后就携家避居天津。之后杨度等人从袁世凯那里领取了20万元的活动经费，为袁世凯复辟大肆宣传的“筹安会”正式开张，杨度还公开发表《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筹安会开张后一个星期，梁启超就发表了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驳斥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反对改变国体。首刊该文的《镜报》一时洛阳纸贵，当天即“售罄无余”，以致人们为争先读到此文而辗转抄读，许多人到报馆要求再版加印，社会影响之大由此可见。在梁文发表前，袁世凯得到消息，立即派人携20万元巨款前往天津贿赂梁启超，企图让梁启超不要发表此文，梁启超不为所动，不仅将钱退回，还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抄录了一份，寄送袁世凯。^①

民国初年，对进步党要人林长民、汤化龙、刘崇佑等，袁世凯也着意拉拢，他送出很多次大笔的政治性怀柔费，也是为了收买他们。这些政治怀柔费多通过梁士诒等人经手。有一部分实力派人物，如广西都督陆荣廷、江苏都督程德全等，原来就和袁世凯接近，并不打算投靠国民党，但国民党方面却在拼命拉拢他们。对这一类人，袁世凯就不免要给政治性的稳定人心费用，既有每次馈送10万元、8万元的大数目，也有每次馈送都在10万元以上、有时多至40万—50万元特大数目，目的是使他们下决心拒绝国民党的

^① 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

争取。^①

对于那些原来就与自己关系不错的势力，袁世凯也通过特别费来巩固关系。包括对自己的嫡系部下，袁世凯也要给钱加以笼络和稳定。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最重要的大将之一，在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曾任禁卫军的统领，虽是“自己人”，袁世凯也要赠送大量金钱给他。袁世凯对手下另一员最重要的大将段祺瑞也是一样，给他大笔政治怀柔费。但袁世凯对在中央政府任要职、手握重兵大权的段祺瑞最不放心，因此还通过袁克定给段祺瑞手下五六个亲信大笔金钱。袁世凯手段凶狠，收买了段祺瑞手下的主要军事人物以后，就把段祺瑞软禁起来，不许段问事了；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嫡系第六镇统制李纯任第六师师长，也长期接受袁世凯政治性怀柔费。1913年4月，袁世凯为了镇压“二次革命”，派赵秉钧等签订了出卖大量国家权益的“善后大借款”（总借款额2500万英镑），4月28日，在五国银行团先期支付50万英镑后，其中一部分立即就被袁世凯拨发给张勋和李纯部，作为收买他们出兵的费用，5月5日，李纯的第六师就由保定南下河南信阳，对在安徽的国民党人柏文蔚等形成压迫态势。7月2日，又电令李纯第六师一部开往九江、湖口，进逼江西。8月4日，在李纯部进占江西后，他一方面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同时特发10万元银币作为犒赏。

袁世凯对后起的和新兴的师、旅长以上的军政人物，也要给予政治性贿赂钱款加以收买。如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掌握两广军事实力的龙济光，都收受袁世凯贿赂之款项。龙济光被袁世凯收买

^① 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第109页。

以后，在西南（旧时对包括福建、广东、广西在内的南方地区的称呼）镇压国民党，杀人不计其数，向袁世凯报了大功。

袁世凯统治时期，作为袁世凯在东南地区活动的代理人，杨士琦（原直隶总督杨士骧之弟）和赵凤昌在江南地区相互配合，开展活动的范围（尤其东南地区）很大，影响也很大，各方都在拉拢他们，袁世凯授意给他们的特别费就不止40万—50万元。

二、软禁和购买，对黎副总统双管齐下

一部分实力人物，自己有相当实力，以往并不依靠袁世凯，是袁世凯特别注意的目标，所花的政治收买费可谓不少。黎元洪就是其中之一，袁世凯对黎元洪用了很多心思。

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夕，官至湖北新军混成协统领，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逼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1912年1月被推举为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黎元洪无论是奉命出任依附袁世凯的共和党理事长，为袁出面办理政党政治、国会选举，还是在“二次革命”中站在袁世凯一边，参与镇压国民党人，以及在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他当选副总统后，都不愿放弃湖北都督，也不愿离开湖北到北京。因为黎元洪心知自己不是袁系人马，要时刻提防被袁“暗害”。在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选举过程中，当国会议员们举行第三次选举投票时，大总统是从袁世凯和黎元洪两人中决选。据说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绕室彷徨，脸似严霜，袁世凯的表现印证了黎元洪的自保举动，并非多余。故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典礼，按理，副总统也应一同就任，但

黎元洪是在湖北都督府就的副总统职。

由于黎元洪不被袁世凯视为自己人，其所处的位置又很重要，因此，袁世凯始终对他极不放心，不会放任黎元洪长期游离在自己的直接控制之外。所以，黎元洪虽然在镇压“二次革命”中为袁世凯立下汗马功劳，袁世凯为此授予他一等文武勋章，赠予他“民国柱石”匾额，袁世凯仍处心积虑地要将他从老巢调出来。黎元洪也知道自己一旦离开湖北，恐怕凶多吉少，因此死活不愿离开武汉一步。

1913年12月8日，袁世凯派段祺瑞亲自到武汉“敦请”黎副总统进京，段祺瑞的地位和面子，非以往的特使可比，黎元洪不得不给他面子，而且段祺瑞耍了个滑头，说袁大总统请副总统进京商量要事，只需几天即可回武汉。黎元洪推辞不得，只得匆忙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对部下作了一些交待，要他们为自己过几天能顺利回来做好“准备”。但是，袁世凯根本不管湖北方面会有什么反应，黎元洪还在进京的路上，袁世凯就发布了由段祺瑞署理湖北都督的命令。这一命令，相当于向湖北方面表明已做好武力镇压的准备。黎元洪到北京后，袁世凯以隆重的礼仪接待他，表面上打得火热，但就是不提让他回武汉的话，并安排他住在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瀛台，黎元洪明白了，他实际上是被袁世凯软禁了！

当时，虽然在袁世凯左右说黎元洪坏话的人很多，但假如黎元洪在安全上出了问题，对袁世凯还是很不利，因此袁世凯要确保黎元洪的人身安全；但另一方面，当时黎元洪的地位名望都颇高，各方面的人都想拉拢黎，这也使袁世凯很不放心。因此袁世凯把黎元洪安置在新华门内南海瀛台居住，警卫严密，说是为了确保他的